

东江抗日根据地——

华南敌后抗战的坚强脊梁

■周一

朱德曾在《论解放区战场》中，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战争中，华南抗日武装力量在党的领导下，转战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创建了东江、珠江、琼崖等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敌人展开英勇拼杀，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东江地区范围主要涵盖今天广东省的惠州、河源、汕尾、东莞、深圳一带，东接潮汕，南抵香港，直面大洋，海运便利。这里地形复杂，群山连绵，进可游击歼敌，退可据险固守，是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理想之地。全面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广州沦陷后，驻扎在此的国民党军主动撤退，侵华日军随即在东江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外有强敌、内无友军的艰难处境下，中共广东省委遵照党中央指示，高举抗日大旗，组织人民武装，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由此拉开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序幕。

坚持党的领导

为抵抗日军侵略，东江人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先后组建起多支武装力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莞县抗日游击大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部队成立之初，面临一无补给、二少枪弹、三缺干部的艰难处境，难以对日伪军形成有效威慑，生存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任务非常艰巨。在此情况下，各地党组织坚定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当地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从而在部队番号、物资供给、武器装备等方面获得一定支持。

1938年底至1939年4月间，东江地区党组织领导的多支抗日武装被改编为国民党第4战区的部队，获得公开合法地位，为部队开展扩军、筹粮、宣传等工作提供便利，也符合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新形势。与此同时，这些部队在内部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独立与编制独立，在作战指挥、军事训练、思想教育、干部任用及经费管理等方面完全独立自主，本质上依然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加强自身建设，部队从成立之初便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模范，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政治工作体系与制度，面向全体官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讲解抗战形势，组织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重要理论著作，极大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增强了他们的抗战信心。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发生逆转，在逐步进入战略反攻的形势下，充分发挥华南抗日武装与根据地的作用，鲜明树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旗帜，显得尤为重要。同年12月2日，根据党中央指示，以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为基础组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纵队下辖7个大队，共3000余人，不仅拥有完善的司、政、后机关，还增设了报社和新闻处，进一步提升东江地区人民武装的战斗力和影响力。

纵队成立后，立即投入打击日伪、拓展根据地的战斗中。他们在广九铁路沿线频繁出击，积极开展游击战、破袭战，使得这一地区的敌军交通几近瘫痪。与此同时，纵队还组织部分力量向粤中、粤东一带挺进，推动全省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发展，为自身及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壮大奠定重要基础。

壮大东江根据地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东江地区就汇聚了我党大批先进分子。他们组织当地农民成立农会、发动武装暴动，为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开展了大量工作，也为日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为切断中国对外联系，在已占领的广州、香港等地实施严密封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一区域更成为日军重要的后方中转枢纽，敌人随之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摧残与反复“扫荡”。1941年年中开始，日军对大岭山、阳台山一带频繁发动“万人扫荡”，妄图彻底摧毁根据地政权。危急关头，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依托有利地形与深厚群众基础，采取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灵活战术，在保存自身力量的同时主动寻机歼敌，先后取得百花洞、阳台山等战斗胜利，成功粉碎日军的“扫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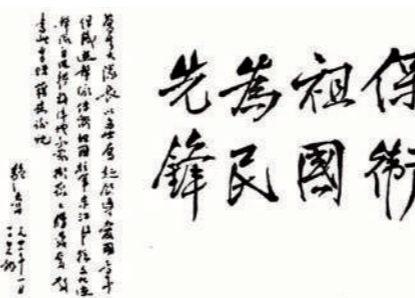
随后，为恢复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与经济贸易，东江抗日根据地以延安大生产运动为榜样，积极组织干部群众利

用战斗和训练间隙开垦荒地、开展农副业生产。为减少开支，许多部队主动缩小编制，取消中队建制，由游击大队直接指挥小队，中队长改任小队队长、小队长改任班长，其余兵员组成生产队，支援地方生产。同时，为帮助群众共渡难关，部队还提出“节约粮食，救济灾民”的口号，号召官兵每人每天节约一碗粥、一顿饭，省下口粮接济群众，这一举措缓解了当地群众的粮食困难，密切了军民鱼水情谊。

在政治工作方面，党领导的东江流动歌剧院、惠普剧团等多次深入根据地演出。根据地党组织将这类文艺宣传视为重要的对敌斗争武器，通过歌剧、舞台剧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揭露侵华日军及部分国民党顽军的种种劣迹，以此鼓舞军民心士气，号召广大军民积极投身抗日斗争。东江纵队成立后，部队政治部迅速出台《对当前政治工作的指示信》《游击队之英雄》《服役优恤奖惩暂行条例》等文件，着力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并以此为依据，深入开展动员、练兵与激励工作，发起扩军和杀敌竞赛活动，使得对敌斗争形势愈发活跃。

广泛团结力量

广东自古以来便是著名侨乡，东江抗日根据地紧邻港澳，坐拥众多大型港口，与东南亚地区海上往来密切，这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和争取外援提供了极大便利。在抗日游击队筹建初期，就有不少回乡侨胞主动捐款捐物，甚至直接送来步枪、子弹等轻武器。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根据地党组织的宣传动员下，旅居南洋的东江华侨相继成立南洋惠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海陆丰同乡会等



上图：1942年1月，邹韬奋从香港脱险后，在白石龙题词：“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

左图：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的东江纵队纪念馆。

组织，全面负责海外侨胞支援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各项事宜。

在这些组织号召下，广大侨胞掀起回国抗战热潮，“父母送儿女、妻子送丈夫、家长带全家”奔赴东江抗日的动人场景屡见不鲜。海外东江侨胞还积极开展义卖、义演活动，发起难童捐、救灾捐、购机捐、寒衣捐、劳军捐等赈济行动，筹集了大量物资，有力支援了根据地和抗日部队的建设。

东江抗日根据地还是重要的统一战线战略堡垒。在长达数年的抗战中，当地军民在党组织领导下，不仅成功营救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还营救了国民党驻香港代表陈策等友军重要人士，以及美国、英国、印度、丹麦、挪威等多国军人近百名。这一系列营救行动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扩大了根据地和东江纵队的影响力，为盟军之间开展深度合作、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多年浴血奋战，东江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撑，东江纵队更成长为一支驰名中外的抗日武装力量，令敌人闻风丧胆，东江地区也被敌人视为难以拔除的“眼中钉”。1945年，根据党中央部署，东江纵队抽调部分兵力挺进粤北，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合，为开辟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湘赣桂边根据地奠定基础。8月28日，两支部队胜利会师，顺利完成重要战略展开任务，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粤赣湘边纵队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热爱祖国、共赴国难、义无反顾、舍身救亡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在后续的革命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承与弘扬。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銃响炮鸣震疆场

——中国古代銃炮

■曹波

火銃作为中国古代火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朝迎来长足发展，形制创新呈现两大方向。一部分朝着多管、多发的轻量化路径演进，另一部分向大口径、大重量、强火力的中重型火器方向升级，以车载或固定架的形式使用，广泛应用于攻城守寨、野战、水战等场景。明朝前期，这类火器无论轻重大小，统称火銃。随着形制日益多样，人们逐渐用“炮”来称呼固定或车载的大型火銃，但“銃”“炮”的命名仍常混用。为便于区分理解，我们将西方火器技术传入后的这类火器称为火炮，此前的按照惯例统称为銃炮。

早期銃炮与传统单管手銃同属前置型火器，基本构造相似，主要由前膛、药室和尾翼3部分构成。二者主要区别在于使用方式和尺寸大小，銃炮的口径为便于填装弹药而更大些，同时因其体型更大、更厚重，能承受的膛压更大，进而可承载更大负荷的火药燃烧冲击力，所以威力也非单兵火銃可比，更适合面杀伤。典型代表制品有盖口銃、碗口銃与虎蹲炮。

盖口銃的口径大，且形似古人饮酒用的酒盏，因此得名。早在元朝，军队就已装备青铜盖口銃。收藏于蒙元文化博物馆的元大德二年盖口銃，是我国目前已知现存最早且带有明确纪年的銃炮实物。

明朝的碗口銃与盖口銃并无本质区别，前者因銃口呈碗形得名，二者同属元明时期出现的轻型銃炮。碗口銃的尾部

比盖口銃更为宽大，便于安装在战船或城关要隘的固定架上；銃身从前到后还设有数道加强箍，以增强结构强度。

虎蹲炮因其发射时固定姿态形似蹲虎而得名，是戚继光在明嘉靖年间为打击倭寇，组织部下在旧炮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种轻型銃炮。该炮用熟铁制造，长约2尺，重36斤，周身加固五六道铁箍以防炸裂。它配有铁爪、铁绊用于固定炮身，克服了普通中型銃炮发射时后坐力大、跳动剧烈的缺点。虎蹲炮射程不远，但一发可射出100余枚小弹丸，散布面大，具备较近距离杀伤优势。同时，该炮体轻盈易携，机动性好，还可大仰角发射，适用于山地、水田等复杂地形作战，曾大量装备作战部队。

明嘉靖年间，为扩大杀伤范围，工匠以盖口銃为基础，研制出近10种发射爆炸药的銃炮，包括毒火飞炮、铁棒雷火炮、飞云霹雳炮、火兽布地雷炮、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等。这类銃炮通过适量增加发射火药、填装含剧毒或强腐蚀性火药的铁壳爆炸弹提升毁伤效果。除可单兵使用的铁棒雷火炮外，其余均架设在炮架上发射，多用于攻城作战。作战中，炮弹爆炸后，既能以铁壳碎片杀伤敌人，又能焚烧粮草、毒杀敌人马，实现了銃炮与爆炸弹技术的有效结合。

明朝以来，为提升火銃对集团人马的杀伤力，銃炮型号不断加大，百斤以上的重型銃炮应运而生，代表制品有大将



右上图：明弘治十八年碗口銃。
右下图：明朝虎蹲炮。
资料照片

军炮、攻城炮、叶公神銃及千子雷炮、灭虏炮等。为增强机动性与灵活性，这类銃炮一般架于炮车上使用。

大将军炮诞生于明朝中期，分为大、中、小三型，分别发射7斤、5斤和3斤重的铅弹。该炮最初多为固定式发射，用于守备隘口。后来士兵改用车辆运载，将其应用于机动作战。

攻城炮安装在双轮炮车上，车上设有榆木或槐木挖凿而成的车厢，炮身放置其中，用5道铁箍与车厢固定相连；车厢两侧各有两个铁锚，发射时将铁锚钩在地上，可固定炮车，减少后坐力。

叶公神銃是明朝中期创制的一种重型銃炮，以纯铁打制，分为天、地、元3种

型号：“天字号”重280斤，长3.5尺，是该系列最大号銃炮；“地字号”重200斤，长3.2尺；“元字号”重150至160斤，长3.1尺。它们的核心特点是将銃炮与车轮炮车结合，实现了便于移动的野战化设计，同时采用“公领孙”的一炮多弹发射模式，即一次发射包含一枚摧毁主要目标的公弹和多枚覆盖杀伤的孙弹，兼具精确打击与大范围覆盖杀伤能力，是典型的散弹炮，非常适合野战和攻城。

千子雷炮身以铜铸造，长1.8尺，口径5寸，用铁箍扣在四轮炮车上，车前安有一块隔板，正面迎敌时可隐蔽炮体，临近敌人时去掉隔板突然开火，火力凶猛，能达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链接历史

“长江万里岷峨来，奔流到海如奔雷。”今天的长江口，已是世界上航运最发达、最安全的人海口之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这里曾打响过一场无声的战斗——作战目标是静默潜伏的水雷，执行任务的是人民海军历史上第一支扫雷部队——华东军区海军扫雷大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蒋介石心有不甘，让国民党军制针对大陆重要港口的封锁计划。同年6月，国民党军对上海等沿海城市实施“闭港行动”，多次出动军舰在长江口布设水雷，妄图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国民党军肆无忌惮的封锁和破坏，严重威胁到渔业生产与过往船只的安全。上海的货物运不出去，物价飞涨，百姓陷入极大恐慌，扫雷工作已刻不容缓。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上海市委的要求，第三野战军指示华东军区海军尽快组织力量清除长江口水雷，确保长江口航道畅通。

当时人民海军刚刚起步，既无专业扫雷舰艇，也缺乏相关技术人员。就在这样白手起家的困境中，1950年4月，人民海军第一支扫雷舰队宣告成立。时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亲自点将，任命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参谋长孙公飞为首任大队长兼政委。大队下辖2个中队，人员主要来自教导师3团和侦察营抽调；指挥舰为征用的招商局“中”字111号登陆舰，10艘25吨登陆艇被改作扫雷艇，扫雷装备仅有4条扫雷索。

针对海军官兵扫雷业务不熟的问题，张爱萍在南京海军学校开设水雷班，从华东军政大学选调30余名青年学员入校突击培训。这些学员还与扫雷大队官兵一道，集中开展扫雷业务培训。

据张爱萍晚年回忆，当时训练条件极为艰苦，缺乏专业器材，学员们就用木头削成水雷模型丢进江心，以此模拟拖扫和引爆战术演练。孙公飞也回忆道，尽管官兵大多从陆军转来，之前没上过军舰，更没见过水雷，但大家热情极高，不分昼夜地学习海军知识、开展技术训练，仅用两个月左右，基本都能在各自岗位独立操作。

考虑到当时的水雷是通过锚和雷索固定在水下，扫雷方案以割断雷索、使水雷浮出水面为主要目的。具体作业时，扫雷艇拖着一根水下扫雷索前进，钢索侧面装有带割刀的浮体扫雷具。一旦割到水雷，扫雷具会自动向其靠拢，割刀随即割断雷索，水雷便会失去束缚浮出水面。

6月19日起，扫雷大队在长江口九段沙灯标、福庆灯标以南水域，展开首次侦察扫雷行动。孙公飞坐镇指挥舰，通过信号旗调度10艘扫雷艇作业。然而，25吨级的扫雷艇马力不足，在长江口急流中航速参差不齐，难以抵御江面风浪，而且扫雷索太细，不仅未能割除水雷，反而多次拖起沉没水下的杂物，4条扫雷索扯断了3条。此次扫雷行动宣告失败。几天后，扫雷大队再次组织侦察扫雷，依旧无功而返。

初次受挫并未让官兵气馁，他们将航道雷区划分为甲、乙、丙、丁4个区段，结合水文地质条件重新制订扫雷计划，同时开展高强度强化训练。与此同时，扫雷装备也得到改善。在苏联专家指导下，4艘300多吨级的“联”字号登陆艇被紧急改装成扫雷艇，并以革命老区命名为“古田”“周村”“枣庄”“张店”舰。这些舰艇吨位重、马力大，相比此前的登陆艇性能提升不少，特别是它们的舰艏都装有起锚机，更加便于扫雷索的收放操作。

9月21日，第二次扫雷行动正式启动

「海上工兵」初战长江口——华东军区海军长江口扫雷行动

■彭林辉

开。张爱萍进驻吴淞军港坐镇指挥，孙公飞率扫雷编队驶入雷区。4艘扫雷艇将扫雷索定深为6至7米，以梯次队形在4个雷区往返清扫。一时间，江面马达轰鸣，绞车辗转，红色鱼形浮标扫雷具纷纷坠入江心，场面蔚为壮观。然而一连几天，编队反复检查雷区，却始终未见水雷踪影。

就在众人万分焦急之际，在乙区段作业的一条扫雷索突然抖动了一下。刹那间，一个黑乎乎的铁家伙浮出水面。“是水雷！是水雷！”孙公飞通过望远镜确认后，立刻拿起报话机向张爱萍报告。随后，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小心翼翼地把水雷拖到岸边。在排爆专家把这颗水雷处理过后，他们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所有人都难掩心中的激动。当晚，华东军区司令部发来电报：“旗开得胜，扫除敌雷，望再接再厉，克服困难，团结战斗。”

这极大地鼓舞了扫雷大队官兵的士气，此后好消息接连传来。在吴淞口至长江口90公里的江域，扫雷编队先后扫除10余枚水雷，除留存少数供研究外，其余都爆破销毁。为确保彻底清除隐患，扫雷大队对已探明雷区进行4次清扫，重点排查可能隐蔽的磁性、音响性水雷。

至10月底，经华东军区海军检查确认，敌人布设在吴淞口至长江口航道的水雷已全部被清扫完毕，事关上海经济命脉的长江出海口胜利打通。

在关键时刻，人民海军临危受命、勇闯雷区，用生命踏出一条贯通长江口的黄金水道，使上海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维护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稳定，让处于水雷阴霾下的上海海港再次焕发勃勃生机。



雷引爆装置。
扫雷大队官兵成功解除水雷。
资料照片



扫雷大队官兵在长江口航道扫雷。
资料照片